

锐评

证监会“打孩子”之后还应做什么

■ 梁集好

8月30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认定光大证券异常交易构成内幕交易、信息误导、违反证券公司内控管理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没收光大证券非法所得8721万元,并处以5倍罚款,共计5.23亿元。

据资料显示,光大证券2012年净利润10.33亿元,今年上半年获得净利润为8.11亿元。5亿元差不多相当于光大证券去年净利润的一半,证监会已经给出了在法律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额度。

关于这个5亿元的罚单,有市场人士认为处罚及时,反映了证监会对违规交易、内幕交易零容忍的态度。但也不得不指出,此次证监会对光大证券的处理还是轻了些,作为监管者的态度还是暧昧了些。这笔5亿元罚款是要收缴国库的,而对于普通投资者的损失赔偿,证监会的回答则是:光大证券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严重,投资者可以提起诉讼依法要求赔偿,如何赔偿投资者、赔偿多少将由司法机关确定。

实际上,普通投资者若根据现行规定索赔,难度极大。出于辛苦搜集证据后,费时、费力、费钱打官司又不一定得到赔偿等方面的考虑,多数普通投资者会放弃索赔诉讼。对光大证券来说,放弃追究的普通投资者会为其节省庞大的赔偿金。因此可以看

出,证监会的处理并没有充分重视普通投资者的权益。

光大证券使用的操作系统是很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都在使用的,它的套利手法也是很多业内人士熟悉的惯用方法。如此破天荒地搅动了A股指数,就算证监会再纵容情,也无法容忍光大证券此番举动,最终这一巴掌还是打了下去。但是,巨额罚单更多像是对犯错的孩子恨铁不成钢的教训,一定意义上是“打孩子给外人看”。

交易所是一线的监管机构,也是一线的风控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电子交易系统几乎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系统,可以进行实时大额交易监控,这种情况下,异常的巨额买单可以不受限制地冲进交易所,说明交易所对极端事件的处理也不够成熟。

“8·16”事件不是偶然事件,其他券商很大程度上可能存在类似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此次光大证券的异常交易,不仅暴露了自身的风险隐患,也暴露了其他券商以及整个资本市场的巨大风险隐患。

一般来说,客户与证券公司结算层面,需要全额委托,即客户账户上有多少钱才能交易多少股票,想买到超出资金的股票是不可能的。但是交易所对证券公司的自营与资管等非经纪类业务,实行的是会员管理,即在T日过户证券,在T+1日16时后交收资金,所以券商自己在

交易所的交易,理论上可以透支买入。如此看来,与只能进行T+0交易的普通投资人相比,券商们不仅具有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还享有规则优势。

一个放纵“饿狼”庄家的资本市场,只会害死所有的羊,羊若是没了,狼也无法生存。

普通投资人、守法投资人为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在享有最低等的权益。没有对最广大

普通投资者的保护,失去最广大普通投资者的信任,仅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交易,根本不可能撑起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监管部门应该以此事件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抓紧行业整顿,加强交易所的自律和监管力度,打通各交易平台之间的管理障碍,建立更加完善的跨市场监督体系,为中国证券市场春天的到来打好基础。



王利博制图

防止资本逃离关键要稳企业家的心

■ 孟书强

“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一直以心直口快著称的娃哈哈集团接班人宗馥莉,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此言一出即引来无数关注。或许宗馥莉的这番话只是一时口快,当不得真。但在市场经济之下,企业家有“用脚投票”的自由,如果发现某个市场不如另一个市场更有利于企业发展而把整个企业搬离,也并无多少可指责之处。

正如宗馥莉所言,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不可能像他们父辈那样,上一辈企业家大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东风之下发展起来的,对国家、对民族有着更为深厚的感情,价值观念也更为传统。对于他们来说,把企业搬到国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

但是,对宗馥莉这代年轻企业家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国外那种简单

的政商关系,地方政府家长式的管理方式,难免让他们感到不适应。对吃汉堡、喝洋墨水长大的年轻一代企业家来说,把整个企业搬到国外并非完全不可能的空话。相对于他们的父辈,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在不断增加。

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民营企业在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遇到的问题也不断增多,市场的不完善,法治的相对滞后,吴英案、曾成杰案等都让民营企业家尤其是像宗馥莉这样的年轻企业家们对未前景多了一份忧虑。

选择逃离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现实选项。不久前《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布会上,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官员梁国勇证实“中国确实出现了资本外逃的现象”。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1年在受访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主中,约27%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美国移民局的数

据亦显示,2011年美国投资移民EB-5签证全球总申请人数中,中国人占比高达75%。业内人士估计,由此造成的损失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中国吸引的外资。

如果说个人的逃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的话,那么企业的整体搬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是致命的。数据显示,去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民营企业提供了76%的税收,同时解决了90%的新增就业岗位。毫无疑问,即使很小一部分民营企业逃离中国,其影响和危害都将是整个社会和经济不能承受之重。既然无法承受这样的危害之痛,剩下的路就只有一条:直面民营企业尤其是宗馥莉们的烦恼与困惑,用制度进步和完善去挽回他们可能想要飞走的心。

理顺政企关系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之一。但毋庸讳言,几千年的官本位文化影响之下,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

企业家多数时候仍然处于弱势。家长式的企业思维亦仍存在于不少官员身上。如此才让已经适应了简单直接的政商关系的宗馥莉们倍感头痛。

新一届政府履新以来,表现出对理顺政企关系前所未有的决心。总理上任之初就直言政府要把不该管的坚决交给市场,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制度创新在被视为开启中国新改革里程的中国(上海)自贸区被赋予重要地位,“积极探索政府投资和资产管理模式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被写入正式文件。

希望在理顺政商关系方面,在创造世界一流的经营环境方面,类似上海自贸区的类的商业环境能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或许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了这个时代,才能挽回企业家们想要飞走的心,才能让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走的更加踏实和坚定。

变化与选择:大企业在中速增长期

(上接第四版)

面对国际竞争新格局,我们如何“走出去”?我的想法是,用兼并收购的方法收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的高端产业,同时用产能转移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占领市场,也就是要走产业“走出去”的道路。过去我们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今后我们要说“世界是中国的工厂”。我们的产业界要“走出去”,真正融入全球市场。过去我们是贸易人员打前站,大多数制造人员并不熟悉海外市场情况,而今天,我们的制造人员也要走出去,自己上战场,把工厂建在海外。现在中国建材在美国、欧洲已经开始建立工厂,效果不错。过去我们多是出口产品,但遭遇“双反”之后,我们出口受限,只有选择在海外建厂,而国外给出的条件也不错。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包容的文化。我们不能再把国内恶性竞争的文化搬到国外,而是要为当地社会做贡献,与当地企业密切合作,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这些才是我们“走出去”的基础。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走出去”一定会打败仗。所以,“走出去”之前,我们要自己先给自己上一课,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创造增量互利双赢,我们准备好为当地做贡献了吗?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变化和选择。

企业社会化阶段的来临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选择

企业到今天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个人创业阶段,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后来经历了公众化、公司化阶段,企业的主要目标要注重所有者利益和经营者利益,把两个利益平衡好;现在企业进入到社会化阶段,只讲所有者利益、经营者利益或者职工利益已经不行了,我们首先要重视社会大众的利益,把社会责任、企业公民放在公司的前面。在企业的社会

化阶段,谁都不能讲“公司是我家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不管企业资产是谁的,企业首先是社会的,其所作所为必须符合社会要求,必须遵纪守法,必须环保,必须安全,这些都是最根本的。

我前年去参观韩国浦项钢铁,它是怎样进行价值排序呢?第一是社会大众、员工,第二是安全,第三是环境,第四是质量,第五是成本。也就是说把赢得利益放在最后,把关乎社会、关乎消费者、关乎大众、关乎环境或者关乎气候的事项放在前面,这些都是企业经营理念的极为深刻的变化。作为大企业和大企业家,我们首先要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做全球公民、做社会公民,有了这种境界,才有可能做成企业。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企业是做不下去的,尤其是大企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所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化阶段非常重要的选择。

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两家公司今年双双进入世界500强,在中国500强中都排在前列且排名每年都在上升。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两个企业虽然做大了但还不够强,在做强做优、转型升级方面还有很多挑战。但是我相信,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认识不到问题。只要我们认识到了问题就能改变它;如果认识不到问题,只知盲目乐观,为“大”而狂欢,为“快”而狂欢,企业不知会最终走向何方。因此,未来我们仍将居安思危,继续推动整合优化,加快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我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一定能够成为又强又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本文为作者在2013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加)

来论

防止“鬼城”蔓延当刹造城风

“

自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出现后,全国多地都像被传染了一样,许多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新城新区一一现身。

■ 邢滋沂

近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市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大批新城行将出世,让人实在担心这些新生儿恐将赴那些冷清至今的“鬼城”、“空城”的后尘。

建造新城新区曾经是改革开放的重点之一。这些最初的新城新区的确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作出了贡献。可是,要建200多个新城也确实让人惊讶,真的需要这么多新城吗?144个地级市要建200余个,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地方都要建新城,这很有些全民建城的味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各地大兴土木之风,究竟是造福于民,还是营造政绩?

自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出现后,全国多地都像被传染了一样,许多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新城新区一一现身。有人说,建新城是促进城市扩容,加快城镇化建设。但这其实是两码事,促进城乡交流,是人与人的交流,地区间的资源交流,可不是土地的扩充。城市范围扩大可以容纳更多走进城市的人是不假,但是大范围盖高楼、铺宽路只能说促进了这个地区更像个城市,并不代表城乡会出现大融合,广建城市新区也只是求了个形似罢了。

建新城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得量力而行。对很多地区来说扩充一个新区完全是没必要的,一个地区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资源和空间来容纳都要以实际水平说话,比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否对等、分布情况如何等等,从这些数据里看有没有必要城市扩容,仅靠对导入人口的未来规划太不现实。就像国内某些“鬼城”,虽然已经开始有复活的迹象,但是按预期的导入人口目标算,让这个新城活跃起来要等100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本身产业不够发达,经济发展能力不强导致大量人口出走,实际居民的居住率并不高,而政府又一再开发新城,就如同一缸水一边外流一边注入,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造城风已经被掀起,如今也到了该刹住的时候了。从我国开始推进城镇化建设,很多房地产商就看准了这块肥肉,一直发展到近些年房地产的泡沫越吹越大,完全没有泡沫破灭的风险意识,但是随着各地浮现的“鬼影”,已经证明了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迹象。现在各地区之所以大肆发展新城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入侵,很多企业都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以政府当靠山借贷融资用来开发,而很多当地政府只看到了短期效益在开发时造成谈判,最后却背上了不良债务的包袱。鄂尔多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但没有造福当地经济反而成了拖累。在“造城风”要吹向更多地区的时候,如不及时遏制,恐怕将有更多地区要开始唱“空城计”了。

更重要的是,新城区的建设应该为民众所建,得民心才不会变“鬼城”。古语道: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说到底,政府的建设规划最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在居民身上。今年以来,政府反复强调民生问题,为的就是纠正过去政府工作中形成的一些不良之风,拉近与基层百姓的关系,重新摆正官与民的位置。

“造城”这股风刮到现在,跟风的地方越来越多,有的是真实需要,而更多的是盲目追随。投入城市的发展,是个长远计划,首先就必须实现建立的资源是有用的,能够被吸收和消化的,这与无数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只图短期面子好看,拿群众的利益做自己的政绩,为自己晋升修筑道路,老百姓怎能不怨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城市的根基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座座新城之所以在那变成了“鬼城”、“空城”,这是老百姓不买账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很多地方的居民并不支持造新城的做法,甚至为之苦恼抵触。这足以说明部分地区城市的建设只图某种目的或利益,并没有以民为本。有些地区甚至不顾一切削山去海下足了功夫,老百姓没有享到什么福利不说,最后还变成了一笔笔无效投资。无钱的老百姓仍然买不起房,只能是望房兴叹。还有的老百姓被逼拆房,引来骂声一片。相反,如果将建城的心思用在有限的空间里扩大无限的资源,把利益福祉扩大化,真正把实惠落在群众身上,去了解民情,解民愁,群众鼓掌叫好,那才是促进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比建起一座座费力不讨好的空城更实际得多。

城镇化建设不是面子工程,走群众路线更要学会照镜子,治病,不能有病不治,更不能边整边犯。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就是一面反面镜子,神木也是一面反面镜子,无论是一国发展还是一个城市的兴旺,看长远利益才能走得稳妥长久,体察民意关心最基层的人们最需要什么,纠正不良之风具有重要意义,要及时刹住“造城风”。

“鬼城”不能蔓延,更不能席卷中国。“病根”找到了就应该用心去治,只有刹住造城风,管住地方政府不安分的手,才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为民、为企业谋取福利的事业上。